

传统文化与现代理念撞击下的革命—— 北洋时期师范教育的价值重塑

伍小涛, 方勇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研究生部, 贵州贵阳, 550028; 南京大学历史系, 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 北洋时期是一个无中心的“断裂社会”时期, 在政治和文化上出现了权力真空, 处于传统文化和现代理念撞击下的师范教育也迅速嬗变蜕化。由于进师范学校的一般是贫寒学子, 他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改变处境, 但是他们毕业后仍然面临着就业和生活的困境。他们因为在学校接受新思想的熏陶, 所以, 从某种意义上说, 师范生是北洋时期社会上最危险、最能引起革命的人群。20世纪2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从某种角度可以说是这些师范生发动的。因此, 师范教育的革命价值远远大于它的实用价值。

关键词: 北洋时期; 师范教育; 革命

中图分类号: G6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7)03-0480-04

北洋时期(1912—1927年)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在此时期, 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 它“不再是一个以读书人为中心的四民社会, 而是一个无中心的‘断裂社会’”^[1]。在这个社会中, 不但知识分子处于边缘化, 工人、农民、军人、商人也处于边缘化。由于社会失序, 掌控政治权力和权利的是军事和经济强力, 因此, 军人和商人因社会的需求而崛起。同时儒家文化由于失去国家制度化的依托, 顽强地与尊西崇新的主流文化抗争着。由此社会出现了巨大的政治权力真空和思想权力真空。处于传统文化与现代理念撞击下的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师范教育乘势播下革命的种子, 从而促进了20世纪2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根据朱熹的观点, 传统教育的宗旨是: “立学校以教其民……必始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 礼乐射御书数之际, 使之敬恭, 朝夕修身孝悌忠信而无违也。然后, 从而教之格物致知, 以尽其道; 使知所以自身及家而达之天下者, 盖无二理。”^[2]这当然是“统治者利用教育作为统治的工具, 从这个出发点来制定各项制度, 这些制度都只是有利于统治阶级, 不利于劳动人民。”^[3]随着西方政治教育思想的传入和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的胜利, 教育宗旨突变为: “注重道德教育, 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 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4]。固然, 如孙中山所论: “今破坏已完, 建设一事伊始, 前日寓于破坏之学问者, 今当变求建设之学问, 世界进化, 随学问为转移。”^[5]重要的是时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 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 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 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 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我国地宝不发, 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 人民失业者之多, 而国甚贫。实利主义之教育, 固亦当务之急者也。”^[6]因此, 民元时期, 教育迅速发展。以山东为例, 1912年, 仅全省小学教师就比1911年增加1459人^[7]。但历史进入袁世凯统治时期, 这种新式的资产阶级教育“迄于今日, 不惟未见其盛大, 且反日即于衰微”。究其原因, 按当时教育总长范源廉的说法, 则是“向之热心学务者, 已多趋于消极; 而一般社会之人, 又对于新教育多怀疑阻也”。而怀疑消极的原因又则是“后生小子, 竞尚自由, 倡言平等, 于家庭主破坏, 于学校起风潮, 于社会为逾闲荡检、非道无法之举动, 其祸视洪水猛兽为尤烈, 是弊害之最大者也”^[8]。因此, 1913年袁世凯颁发了《注重德育整饬学风令》, “著教育部行知京师各学校校长, 并督饬各省教育司长, 凡关于教育行政, 一以整齐严肃为主。学生有不守学规情事, 应随时斥

收稿日期: 2007-04-20

作者简介: 伍小涛(1967-), 男, 湖南衡阳人, 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2006级博士研究生,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华民国史, 中共党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退,以免害群指示怨傲”^{[4](3)}。随后又颁定了教育要旨,把“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躁进”作为新的教育要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晚清教育宗旨的翻版。1906年清政府颁布学部奏请的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实。”显然它们有很大的相似性,这反映了政治上的倒退,随之而来的则是文化教育上的复古。但随着袁世凯的去世,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各种教育思潮如杜威实用主义教育、义务教育思潮和平民主义教育思潮等传播及各种教育方式如五段教学法、道尔顿制等的推行,教育宗旨也不得不为之一变。具体为:① 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② 发挥平民教育精神。③ 谋个性之发展。④ 注意国民经济力。⑤ 注意生活教育。⑥ 使教育易于普及。⑦ 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4](32-33)}。到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又把三民主义作为中华民国教育之根本原则。

北洋时期这种教育宗旨的变化,固然反映了政治生态的变化,但更重要的则是反映了文化的变迁。在传统社会里,以“三纲五常”为表征的儒家伦理思想占主导地位,当然“忠君报国”作为教育宗旨,尊孔读经为其外在表现。而在现代社会里,“自由”“民主”“平等”等为其理念,教育准则当然为“谋个性发展”“发挥美感教育”。但是这种变化不是非线性的、单调的,而是复调式的。例如在现代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大盛时,传统的国学和私塾教育也如火如荼。据记载,在偏僻的宁夏固原县“当时私塾,遍布全县,人口集中市镇有,偏僻山区亦有。仍沿古例,学生入学有挚敬,冬至有礼节,塾师所需毡鞋,木炭各钱,由学生分摊。教材为《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和《四书》《五经》等。学生最多为三十人,中等者十二三人,个别私塾还有女生,人口稀少山区每一私塾仅有学生三五人”^[9]。因此,正如一书所述:“地方统治者对教育只限于短期利用,中央政府法定的教育宗旨影响有限,所以教育思想相当活跃,各种教育思想支配下的教育形式、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并存。一方面,资产阶级教育改革思想、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对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封建主义的教育思想仍占据着学校舞台,以讲学经书为内容的私塾遍布城乡,许多学校在国语课中讲授《曾国藩家书》《朱子格言》《诸子文粹》,封建的伦理观念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教学。”^[10]这在传统文化里有现代理念的渗入,在现代理念里有传统思想的复活,是传统和现代的犬牙交错。处于此种传统文化和现代理念撞击下的北洋师范教育,由于自身的异质结构特征,迅速

嬗变蜕化,从而诞下了革命的种子。

二

北洋时期,随着新式学堂的创办新式教育的普及,各地对师资力量的需求越来越急切。以福建为例,截至1927年,全省有省立中学9所,县立中学34所,其它各种形式的中学71所,全省合计有普通中学114所,比清末的中学数增加数倍之多^{[11](337)}。因为急需大量中学教师,所以,政府和地方绅士、华侨商人等投身师范学校的创办。师范教育迅速发展起来:民国5年,全国有师范学校195所,教职员3256人,学生24959人,经费3077746元;民国14年,全国有师范学校301所,教职员3951人,学生37992人,经费4368262元^{[12](311)}。

按照1912年9月教育部公布的《师范教育令》,师范学校分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省立师范学校和县立师范学校。其中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全国有6所,即北京、南京、广州、武昌、成都、沈阳各一所。而省立、县立师范学校则由省行政长官规定地点及校数,报告教育总长分别设立。不管国立还是省里,师范学校的学生一般免交学费,并由学校给以膳费及杂费。这也就为处于社会边缘的贫穷学子提供了就学的机会。毛泽东、蔡和森、徐向前、黄克诚、刘顺元等一大批人就是由此而走进了师范学校的大门。据黄克诚自述:对于在收成好,人不害病,牲畜不死亡的情况下,一年劳动所得,勉强可以糊口;而遇到灾年,或者人、畜出问题就要借债的他的家庭来说,师范学校是当时唯一能读得起的学校^{[13](1-9)}。而那些家境比较富裕的学生,大都去读除师范以外如法政专业的学校。在福建省城福州的两所公、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最大限度地扩大招生数,仍满足不了考生的要求,以致另有4个单位未经正式批准,也办起法政专门学校,使1912、1913年2年,法政招生失控^{[11](333)}。

根据1912年公布1916年修订的《师范学校规程》,师范学校的教师应以下内容教育学生:“1. 健全之精神宿于健全之身体,故宜使学生谨于摄生,勤于体育。2. 陶冶情性,锻炼意志,为充任教员者之要务,故宜使学生富于美感,勇于德行。3. 爱国家、尊法宪,为充任教员者之要务,故宜使学生明建国之本原,践国民之职分。4. 独立博爱,为充任教员者之要务,故宜使学生尊品格而重自治,爱人道而尚大公。5. 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势,察社会之状况,实事求是,为生利之人而勿为分利之

人……”^{[4](428)}。因此,北洋时期的师范教育不是传统的士大夫所能独自担当的,而是具有现代思想的近代知识分子才能够胜任。据湖南师范学校的师资调查,湖南师范“当创办时,重要教员都延自日本及留学归来者。最近多就省内外大学,专门师范专科毕业,及留学欧美毕业富有学识经验者”^{[12](326)}。

所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既有国学功底深厚的袁大胡子,又有精通西方伦理思想的杨昌济先生,还有传播新思潮的唐老师^[14]。其中,那些具有新思想和新知识的教师尤得学生的喜欢。黄克诚在湖南三师读书最崇拜的教师是具有现代思想和知识的张秋人先生等。黄谈及这些老师对他的影响后深情地写道:在此之前,我受古书的影响,眼界不宽,思想狭窄,只想独善其身,做一个淡泊正直的人,随遇而安,知足常乐。来到第三师范之后,我才开始接触到时代的脉搏,开阔了视野,就如同从一个狭小的圈子里突然进到广阔的天地,别开生面^{[13](14)}。

而师范学校大都是为中学、小学培养师资力量。一般来讲,这些深受新思想影响的师范学生大都有改造社会改造中国的愿望。徐向前在河边村川至中学附属小学任教时,就经常向学生讲述一些历史故事和当今事件,引导孩子们认识中国、认识社会^{[15](19)}。而残酷的社会现实粉碎了他们的美梦。一是他们的思想不容于社会。徐向前两次被两个小学辞退,就是因为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学生从小就理解这一点(改造黑暗社会),长成有用的人才,担负救国救民的重任”^{[15](18)}。二是教育经费和工资极少。一般来说,高等师范学校的经费由国家给之,省、县师范学校的经费由省给之。而县办中学、小学的经费主要来源于田赋附捐、学田租金、基金利息、杂捐和其它临时收入,而以田赋附捐为大宗。北洋时期军阀混战,各军阀都把教育经费挪用为军费。因此教育经费支绌。如福建省多数县每年的教育经费仅一二万元,有些县不及一万元。所以办学经费几乎全靠自筹。但“地方贫瘠,无款可筹”^{[11](341)}。所以,师范、中小学“当教职员的人,每月得到的报酬多数不过十余元或五六元,全拿来吃饭,还是不够”。“教师待遇过薄,当教师的,多不大愿意。”^{[11](342)}三是一些贫穷的学生面临就业的困难。黄克诚就是因为这情绪日渐低沉:“读了师范又如何?对国家、社会、家庭能起到什么作用?当时社会上就业很困难,我这个贫苦农民的子弟有什么办法去谋个职业?家族花那么大力气培养我,岂不使他们大失所望。要能考上大学也许会好一点,但路费、学费又从

何而来?不能上大学,又不能就业,那么眼下学这些功课有什么用?”^{[13](10)}

三

20世纪初的共产主义运动,固然是无产阶级壮大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结果,但起领导作用的还是知识分子。这主要是因为农民是小生产者,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和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必须依靠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而工人虽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但文化的落后,也直接决定他们不能充分反映自己的政治诉求;而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优良传统、对社会敏锐的观察力及对新知识的熟练掌握从而充当了时代的代言人。

而北洋时期的知识分子,正是处于从主流到边缘的过渡阶段。由于他们远离有着“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进入自由浮动的都市空间。他们“不能不谋自存之道,不能不服事畜之劳。于是无问其所学为工、为农、为商、为理、为文、为法政,乃如万派奔流以向政治之一途,仰面讨无聊之生活”^[16]。而师范生在边缘知识分子中更处于边缘地位。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进师范学校的一般是那些贫寒的学子,想通过自己努力学习改变目前的处境,然而他们毕业后却面临着就业和生活的困境。在学校,他们又接受新思想的熏陶,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师范生是社会上最危险、最能引起革命的人群。事实上也是如此。五四运动在全国的爆发,在许多地方都是师范学生起着领导作用。如湖南的五四运动就是由毛泽东、何叔衡这些师范生发起的。成都也是如此,由刘砚僧、王维彻等高师学生等团结全市学生掀起的^[17]。许多师范学校如湖南一师、常德师范学校、衡阳三师等师范学校为革命培育了一大批卓越人才,如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滕代远、粟裕、帅孟奇、黄克诚等,成为当地革命的中心。因此,从这一方面来讲,师范教育走向了它的反面。北洋时期的师范教育本来是为了培养人才,以维护北洋政府的统治的,然而,培养出来的学生却充当了它的“掘墓人”。

同时,北洋时期也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政治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此时期,知识分子通过现代新式学堂这一重要途径,树立起民族主义、民主、自由、科学和向西方学习等一系列新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政治的黑暗和动荡、人民生活的颠沛与流离、科学与民主新思想的传播等,又通过这些具有新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思想的师范教师这一媒介,迅速植入一大批中小学生的政治生活。王凡西的回忆充分说明了这

一点:“在未接触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之前,我们这些孩子简直没有精神生活的,浑浑噩噩的。拿我个人来说吧,除了演义小说里的人物引起我一些奇异的空想之外,更不会想到比饮食游玩更多的事。而新影响却在孩子们的心灵里打开许多窗,让我们由那里看见许多未曾前见的境界,尝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乐趣,以致引发了对远大事物的憧憬和向往……总之,五四精神使我们变成了染上时代狂疾的小志士,变成了好高务远的理想家。”^[18]也就是说,在这种新的政治思想和具有这种政治思想的师范学生的影响下,许多处于“断裂社会”的边缘的知识分子愈来愈游离主流社会,走上反叛旧体制的革命道路。因此,从这一角度上说,师范教育的革命价值远远大于它的实用价值。

参考文献:

- [1] 许纪霖. “断裂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编者序)[A]许纪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C]//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5. 2.
- [2] 杨少松.v 中国教育史稿(古代、近代部分)[M].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9. 141.
- [3] 顾树森. 中国历代教育制度[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 3.
- [4] 宋恩荣. 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 [5] 孙中山. 民国教育家之任务[A].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C].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1005.
- [6] 蔡元培. 对于新教育之意见[A]. 高叔平. 蔡元培全集(第二卷)[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130.
- [7] 山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山东省教育志[Z].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3. 778.
- [8] 范源廉. 说新教育之弊[A].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C].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1 047.
- [9] 固原县志办公室.民国固原县志[Z].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1. 81.
- [10] 常德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常德地方志·教育志[Z].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4.
- [11] 刘海峰. 福建教育史[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6.
- [12]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编写组.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Z]. 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影印), 1971.
- [13] 黄克诚. 黄克诚自述[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4] 埃德加·斯诺. 西行漫记[M]. 董乐山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122-123.
- [15] 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上)[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4.
- [16] 李大钊. 李大钊文集(上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426-427.
- [17] 秦德君. 火凤凰: 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M]. 北京: 中央编辑出版社, 1999. 5.
- [18] 王凡西. 双山回忆录[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4. 6.

The revolution with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idea colliding ——Restructuring normal education' value in Beiyang period

WU Xiaotao, FANG Yong

(Guizhou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of CPC, Dept. graduate, Guiyang 550028, China;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e Beiyang period had been an acentric "fracture society", the authority vacuum appeared in politics and culture, the normal education with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idea colliding was also evaluating rapidly. Those who entered normal schools were intellectuals from humble origins and they made great efforts to change the unfavorable situation. However, after graduation they had to confront with the dilemma of employment to make a living. In school, they were positively influenced by the new ideas. So, to some extent, the students of normal schools were the most "dangerous" and the most revolutionary factor. In a sense, they led to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the 1920's. Therefore, in Beiyang period normal education' Revolutionary value was greater than its practical value.

Key words: Beiyang period; normal education; value

[编辑: 汪晓]